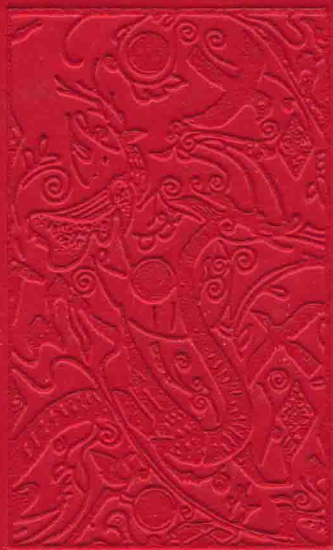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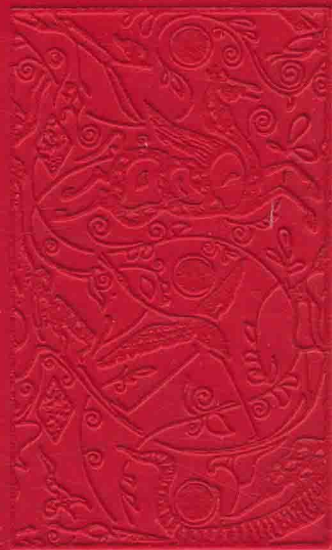


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著 徐卫东／編

彩圖增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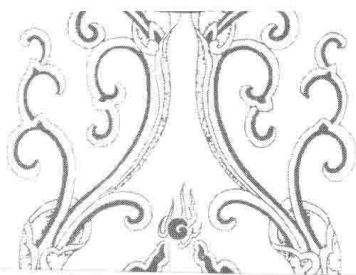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著 徐卫东／編

彩图增订本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彩图增订本/蒋廷黻著;徐卫东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6.3

ISBN 978-7-101-11512-3

I.中… II.①蒋…②徐… III.中国历史-近代史 IV.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9723号

-
- 书 名 中国近代史(彩图增订本)
著 者 蒋廷黻
编 者 徐卫东
责任编辑 徐卫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6年3月北京第1版
201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1 $\frac{7}{8}$ 插页8 字数230千字
印 数 1-15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512-3
定 价 54.00元
-

出版说明

蒋廷黻先生（1895—1965），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外交家。1912年赴美留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高足、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 H. Hayes）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1923年归国，相继执教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他当日所提携、培养的弟子，有许多后来术业有专攻，成名成家，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何炳棣、邵循正、郭廷以、夏鼐、姚薇元、吴相湘等。

面对内忧外患日深的局面，蒋廷黻先生将目光投向了近代史的研究，编纂《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并撰写了《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郭廷以先生说：“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1935年，蒋先生走上政坛；此后，除1938年在汉口短暂赋闲时期撰写了《中国近代史》一书外，直至临终，再没有返回他心爱的学术园地。

《中国近代史》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全书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叙述到其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将近百年的史事浓缩在短短五万七千余字的篇幅里，主题鲜明，史论兼具，反映了蒋廷黻先生十多年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性思考，对今天的读者也不无启发作用。七十多年来，这本书在海峡两岸风行不辍，不愧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沈渭滨先生说：“这本被他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

《中国近代史》最早于1938年由艺文研究会出版、商务印书馆发行（列“艺文丛书之七”）。1939年，青年书店翻印，易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1949年，台湾启明书局重排《中国近代史大纲》，蒋廷黻先生为之作“小序”。1987年，岳麓书社增补《琦善与鸦片战争》等三篇文字，以“中国近代史（外三种）”为名出版。由是，两种书名并行于世。但囿于时代与环境等因素，两岸再版之书多有删节或改动，与初版本相距甚远，而对原书失误之处仍多依旧。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选择1938年初版本为底本，增补启明版“小序”和蒋廷黻先生所撰九篇论文，仔细核查校正引文，对行文讹误处出“编者按”以说明之，期待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一册文字较完善、内容较充实的《中国近代史》。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用字、表达习惯跟目前大陆不尽一致，除极少数地方因故予以技术性处理外，一般不做统一修改，以尊重历史和蒋廷黻先生本人的习惯，敬祈周知。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6年1月6日

小 序^{*}

这本《中国近代史大纲》是民国二十七年五、六两月起草的。那时我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安逸，于是趁机写这本小书。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 编者按：小序摘自台湾启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九四九年）。

总 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清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

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

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司哥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还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却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我国的满清一样，

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已加了许多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澈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澈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 编者按：基马尔，即土耳其政治家凯末尔。

小 序 / 1

总 论 / 1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 2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 7

第三节 东西对打 / 10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 15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 19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 22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 27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 34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 38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 43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 47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 54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 59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 62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 69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 78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 92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 97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 102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 107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 113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 119

第七节 □□□贯澈总理的遗教 / 123

附录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 128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 134

百年的外交 / 185

再论近百年的外交 / 197

评《清史稿·邦交志》 / 204

琦善与鸦片战争 / 224

李鸿章 / 252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 264

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 / 343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原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彝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原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

借以羈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 编者按：此处有误。随带一只鞋子的，是卫三畏的一位中文老师；这位老师是准备伪装成“一个给外国人做鞋的中国师傅”。马礼逊的一位中文老师总是随身携带毒药。此条得自秦传安先生的提示，特此致谢。